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 4 期
2003 年 6 月，頁 63～94
本文 2003.5.15 收稿，2003.6.11 通過刊登

論文學中的李陵形象－以中島敦＜李陵＞為探討中心－

黃翠娥*

摘　要

本論文主要目的是以日本近現代文學作品－中島敦的＜李陵＞爲研究對象，探討作品中中國素材之呈現方式以及呈現之意義。所採取的研究方法爲分析中島敦＜李陵＞作品的獨創性，並同時與中島敦的其它作品做一比較，深入探討＜李陵＞主題，除此之外，並查閱中日文學中其它有關描述李陵的文章，冀望能夠比較出中日文學、文化的差異點。

關鍵詞：生死觀、生存極限、存在的不確定性、敘事詩之美、
純粹無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The Figure of “Li-ling” in the Literature Thesis —Take Zhong-Dao-Dun “Li-ling” as the Core of Exploring

Huang, Tsui-o*

Abstract

The thesis was originally created for the motif to cooperate with the “Historic books reading and research club – on the culture interflow of China and Japan” counsel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sis took the Japan modern times literature work – Zhong-Dao-Dun Li-ling as the research target, exploring the way of presenting and the meaning of the China source material inside the work. The applied research method is by analyzing Zhong-Dao-Dun Li-ling unique originality work, and in the same time, also compared some of the other works of Zhong-Dao-Dun, and in-depth exploring the theme of Li-ling, other than this, also look up from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works for other related articles describing Li-ling, hopes to bring out th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discrepanc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Key words: Comparison of Culture, The conception of life and death, The extreme to survive, To narrate the beauty of a poem, Pure without any impuriti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en University

文学に見られる李陵のイメージ
－中島敦＜李陵＞の考察を中心として－

黄翠娥*

要　旨

本論文の目的は日本近現代文学の中における中島敦の「李陵」を研究の中心にし、中国の素材が日本文学においてはどのように引用されているか、またこの作品の生成はどのような意義を有しているかについて探求するものである。研究方法としては、まず、中島の「李陵」の独創性を分析し、同時に中島敦のほかの作品との比較を通して、その主題を考察する。また、中国文学及び日本文学の、李陵を記したほかの作品との比較を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日中文学及び文化での差異にも触れていきたい。

キーワード：死生観、生存の極限、判官びいき、存在の不確定さ、
叙事詩の美、純粋無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学系助教授

論文學中的李陵形象－以中島敦〈李陵〉為探討中心－

黃翠娥

一、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

本論文之結構主要以日本近現代文學中的中島敦作品爲研究重點，探討作品中有關中國素材之呈現方式以及呈現之意義，並進一步探究日本文化的深層內涵。

日本文學中不論是古典文學或近現代文學，以中國爲題材的作品不勝枚舉，而中島敦這位日本近代作家又是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例子，在其著作中，除了〈李陵〉之外，其它例如〈山月記〉、〈悟淨出世〉、〈悟淨歎異〉、〈名人傳〉等作品也膾炙人口。甚至可說，以中國人物爲書寫題材的作品成就了中島敦的作家地位。中島敦在中國文學的素養上是有其深度的，因此由中島敦的作品著手探究中、日文化交會的這個主題，應具有其合理性及代表性。

選擇李陵爲研究對象的另一個理由爲，在中國歷史人物之中，李陵並非對日本文化、文學等有深刻之影響，然獨獲中島敦之青睞，這其中是否具有特別的意義呢？尤其，同處於戰爭期間，中島敦是否因此特別感受到戰爭時期人的生存的問題呢？

另外，爲了讓國內讀者對日本作家有一番深入了解，因此在附錄中特別擺入中島敦的年譜、影響創作的相關資料，以及這部作品的敘事詩特質等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之研究目標除了探究文本之主題外，另一個意圖是希望藉此比較出中日文化上的差異，因此研究方法上，主要藉助比較研究的方法，途徑有二，首先爲詳讀中島敦之〈李陵〉，並參閱中島敦其它相關作品，例如〈光と風と夢〉、〈狼疾記〉、〈かめれおん日記〉、〈悟

臺灣博碩士學位論文 期刊資料庫

淨歎異〉、〈山月記〉、〈悟淨出世〉、〈名人伝〉、〈弟子〉、〈北方行〉等，尋出中島敦創作之意圖。由於〈李陵〉創作時期正值二次大戰期間，是否〈李陵〉的創作與政治上的訊息有所關連，因此也將參考日本當時的戰事相關訊息，藉以輔助分析〈李陵〉誕生之要素。接下來的研究方法爲查閱《史記》、《漢書》、《文選》及中國各主要時代之文學家的觀點，以及日本古典作品中提及李陵之文章者，試圖比較出中日自古以來文學作品中的李陵形象。

二、〈李陵〉的世界

（一）〈李陵〉梗概

〈李陵〉的主要情節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敘述匈奴騷擾漢土多年，本在邊疆練兵的李陵，婉拒擔任李廣利大軍的輜重工作，力陳五千步兵，以少擊眾，在獲得武帝的首肯之後，於天漢二年九月，率兵出征。但僅有五千步兵，難於作戰環境嚴酷的胡地有所作爲，再加上倒戈事件，最後功敗垂成被俘；第二章節描述司馬遷爲李陵仗義執言而遭宮刑之辱，後發憤完成史記之作；最後章節則記述李陵與蘇武的互動情形。蘇武受困北海，李陵前往探視，終了，蘇武返回漢土，李陵獨留胡地。

（二）〈李陵〉的創意

中國典籍對李陵多所著墨，而中島敦筆下的〈李陵〉是否有別於中國古籍之處？從〈李陵〉看來，此作不單只是描繪李陵，如梗概處所述，司馬遷也成爲一個獨立章節中的主人公，後文還觸及李陵與蘇武互動的狀況，換言之，這部作品同時讓三個人物登場，究竟其用意爲何？以下分別敘述三人的特徵。

1. 李陵

整體而言，中島敦站在讚賞及同情的角度來塑造李陵形象。中島敦除了遵循中國典籍中對李陵才華與人品的讚揚之外，更是鉅細靡遺地陳述李陵立場之無奈，然而，在此同時也不忘交代李陵的矛盾性格。茲將中島敦筆下的李陵人格特質整理如下：

（1）饒勇善戰、人格受到信賴，關愛部屬、軍紀嚴明：李陵帶領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兵五千，在毫無後援的情況下殺敵萬餘，與此同時，貳師將軍李廣利也帶兵出征，然而兵員三萬，並且後援充足，如此也不過殺敵萬餘，而其本身軍隊亦損失六、七成，兩相比較之下更顯李陵在戰略上的非凡能力。另外，其人格亦值得信賴，文中提及五千兵士深入蠻荒之地，環境惡劣，若不是全軍敬佩李陵的人格，很難繼續前進[1]。以上這兩點內容，雖然也出現在中國典籍中，但是〈李陵〉畢竟是小說，中島敦運用了諸多敘事詩式的修飾語，加強了這兩點特質。李陵在了悟已無退路之時，將剩餘的糧食及乾冰分給士兵，要這些殘兵爲自己尋出活路，而李陵自己卻勇往直前，殺敵無數，展現了大將格局。然而在關愛部屬的同時，軍紀亦十分嚴明，例如，發現到軍中有婦女隨行時，因擔心士氣不振，而處決了這些婦女。雖然這個部份也出現在中國典籍中，但是中島敦在敘述李陵處決婦女時用「簡潔下令」等字眼，突顯李陵身爲一名大將處理事情的果斷特質[2]。相較於此，李陵兵敗被俘後，行動則顯得躊躇不決。中島敦似有藉此性格上的矛盾來說明李陵躊躇不決的行爲應非其本性，必有不得已之處，許是李陵心中蘊藏著更大之作爲才是。以上即是中島敦讚譽李陵之處。

（2）中島敦將李陵兵敗及家族滅門的事件歸結於缺乏天時、地利、人和之故。

天時：北方匈奴屢次來犯，朝廷派不出多餘的兵力給李陵，因此當李陵提出自願以五千兵力出征一事時，武帝欣然同意[3]。換言之，李陵於邊疆訓練軍隊多年，目的是希望有朝一日能爲國爭光，但是機會卻是在最不利於出兵的時刻降臨。

地利：如前文所述，以李陵所率領的步兵要深入胡地作戰，本身就是一項艱困的任務，因爲胡地是敵方熟悉的環境，多爲騎兵，況且

---

1 文本 p.503-504 :「木の葉どころか、木そのものさへ（宿營地の近傍を除いては）、容易に見つからない程の・唯沙と岩と磧と、水のない河床との荒涼たる風景であつた。（中略）統率者李陵への絶對的な信頼と心服とが無かつたら到底續けられるやうな行軍ではなかつた。」

2 文本 p.509 :「李陵は軍吏に女等を斬るべくカンタンに命じた。彼女等を伴ひ來たつた士卒については一言のふれる所も無い。」

3 文本 p.504-505 :「相つゞく諸方への派兵のために、生憎、陵の軍に割くべき騎馬の餘力が無い」、「派手好きな武帝は大いに欣んで、その願を容れ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值秋天，匈奴正是馬肥糧足的最佳時刻，雙方的作戰條件差距過大，因此就地利而言，漢軍一開始就處於不佳的處境當中[4]。

人和：首先是路博德上奏文給武帝所引發的誤解。路博德在因罪被貶戍守邊關之前是大敗南越的有名的伏波將軍，年齡上亦相當於李陵的父執輩，如今卻要這樣的人物半途前往接應李陵，路博德自是心有未甘，於是一面迎接了李陵，一面又私下上奏武帝，謂現時攻打匈奴極爲不智，不如明春氣候適宜時再行前往…武帝閱畢大怒，以爲李陵出爾反爾，貪生怕死，因而下詔要李陵在沒有任何支援的情況下率軍出征，此舉更加深了李陵作戰的艱辛。第二個人和上的障礙是武帝個性偏執所造成的。武帝晚年善猜疑，個性偏執，並近佞臣[5]。路博德事件在未查明之前就胡亂下詔書，隨意糟蹋掉一名良將，後文的司馬遷亦是因武帝的偏執個性而遭到莫大的屈辱。武帝這樣握有絕對權力的人卻偏偏因爲個性上的偏執，而造成良將賢臣等的不幸。第三個缺憾爲漢軍倒戈：當雙方火攻之後，單于鑑於漢軍不敗，心生疑懼，意欲退兵，此刻也正是漢軍死傷累累，彈藥用罄之際，單于若能退兵正好給了李陵一個喘息的機會，偏偏此時有一名叫管敢的軍侯因當眾被副將韓延年責備，且隨行而來的妻子也被李陵以動搖軍心爲由，連同其它婦女一起被殺，管敢心生不滿，於是潛逃胡地，告知單于有關漢軍窮途末路的實況，終於此舉導致李陵兵敗被俘。第四個原因在於奸臣當道。李陵兵敗被俘，傳言降胡，朝中趨炎附勢者爲了迎合武帝的忿怒情緒，紛紛加油添醋，責備李陵賣國求榮[6]。也就在這樣你一言我一語中，武帝終於下詔處決李陵家族。

當然兵敗的原因，在一開始即已經釀成，因爲李陵不該強逞英雄，終至孤軍奮鬥。不過中島敦卻也爲李陵做諸多辯解，例如他猜測

---

[4] 文本 p.503、508：「朔風は戎衣を吹いて寒く、如何にも萬里孤軍來るの感が深い。（中略）彼等の位置は危険険極まるものだつたのである。」、「八萬の胡兵が騎馬の快速を利して、漢軍の前後左右を隙もなく取り圍んでんで了つてゐた。」

[5] 文本 p.514：「漢の勢威の絶頂に當つて五十餘年の間君臨した此の大皇帝は、その中年以後ずつと、靈魂の世 界への不安な関心に執拗につきまとはれてゐた。」

[6] 文本 p.515：「口を極めて彼らは李陵の賣國的行為を罵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陵回絕武帝交代的任務，是因爲李陵自認自己乃是李廣的後代，又年屆四十，在邊疆訓練兵士多年，常思爲國盡力，擔任他軍的輜重工作也未免太難堪了[7]。再者，貳師將軍李廣利乃靠裙帶關係而得到功名，無顯赫戰績，因而不肯隨從。換言之，李陵執意率五千兵士出征的行動，就中島敦看來是不得不爲之舉。

（3）中島敦認爲李陵滯留胡地的理由，除了因家族被殺，悲憤交加，以致斷了回漢之思外，更有諸多主、客觀的理由支持李陵滯留胡地。《史記》言：「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8]；《漢書》內容與《史記》無異：「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9]」。但是中島敦卻寫李陵遭受重兵圍困，受擊失神而被俘[10]。所以並非不戰而降，而是到了毫無反擊能力的地步了。

另一個理由是李陵是爲了伺機獵取單于首級而苟活下來。中島敦將李陵描述成一個深謀遠慮、具大格局的人物。《文選 答蘇武書》中雖也提到「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11]」，但〈李陵〉中更是明確述說了李陵的決定。李陵被俘醒來後，心中馬上浮上兩個念頭，其一是自刎避免受辱？其二則是暫時順從敵軍，再找機會脫逃，並立下功績，將功贖罪？當下李陵即決定選擇後者[12]。

---

7 文本 p.504：「陵は、飛將軍と呼ばれた名將李廣の孫。（中略）年齢も漸く四十に近い血氣盛りとあつては、輜重の役は餘りに情無かつたに違ひない。」

8 〈李將軍列傳〉《史記》卷一百九 鼎文書局 民國 69.3 p.2877-2878

9 〈李廣蘇建傳〉《漢書》卷五十四 啓業書局 民國 67 p.2455

10 文本 p.513：「李陵は又峽谷の入口の修羅場にとつて返した。身には數創を帶び、自らの血と返り血とで戎衣は重く濡れてゐた。（中略）麾下を失ひ全軍を失つて、最早天子に見ゆべき面目は無い。彼は戟を取直すと、再び亂軍の中に駈け入つた。暗い中で敵味方も分らぬ程の亂闘の中に、李陵の馬が流矢に當たつたと見えてガツクリ前にのめつた。それとどちらが早かつたか、前なる敵を突かうと戈を引いた李陵は、突然背後から重量のある打撃を後頭部に喰つて失神した。馬から顛落した彼の上に生擒らうと構へた胡兵共が十重二十重とをり重なつて、とびかゝつた。」

11 〈答蘇武書〉《昭明文選》卷四十一 台灣古籍出版 2001.3 p.3144

12 文本 p.526-527：「亂軍の中に氣を失つた李陵が獸脂を灯し獸糞を焚いた單于の帳房の中で目を覺ました時、咄嗟に彼は心を決めた。自ら首刎ねて辱しめを免れるか、それとも今一應は敵に從つておいて其の中に機を見て脫走する－敗軍の責を償ふに足る手柄を土産として－か、此の二つの外に途は無いのだが、李陵は、後者を選ぶことに心を決めたのである」。

李陵雖然降胡，卻又瞧不起其它降胡的漢人，因此與這批人不相往來，也不幫匈奴訓練軍隊。這完全是因自己本是漢人，對漢朝有人情道義上的考量。當單于爲了攻打漢軍而向李陵請教戰略時，李陵露出不悅的表情拒絕獻策[13]。中島敦筆下的李陵對漢室具有絕對的忠誠之心。

（4）中島敦筆下的李陵並不是完全受意識形態或民族主義操縱的人物，他是位性情男子，同時亦能客觀看待週遭的事物。前者的特質可由與單于及其子左賢王的交往上見出端倪。當李陵目睹到自己不提供戰略給單于攻打漢軍，也不親自出兵，但單于依然一如往常地善待他時，不由得感佩起單于的爲人，視單于爲真正的男子漢[14]。

另外，李陵與左賢王發展出深厚友誼也是促使李陵滯留胡地的原因之一。兩人外出打獵後在帳蓬內享用佳餚時，李陵已感受到兩人間的友誼了[15]。當左賢王與漢軍交戰，李陵一方面希望漢軍獲勝，另一方面卻又十分掛心左賢王的戰績，對於這一點自己都感到十分驚訝[16]。換言之，當狙殺單于不成，而繼續留在胡地的理由，其中之一便是得到了友誼的撫慰。同時，從這一點也可看出李陵感情細膩的一面。另外，家族被殺之後，李陵娶了胡女、生子。妻子的賢慧及對幼兒的骨肉之情是促使李陵安頓下來的重大原因。

在客觀看待事物方面，李陵雖然滯留胡地，卻願意重新認識胡地，並仔細評估胡、漢之差。一般讀者對於李陵身陷夷狄之邦大多報以同情之思，即便是《文選 答蘇武書》，亦提到「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遺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17]」然而，

[13] 文本 p.528：「李陵はハツキリと嫌な表情をしたままロを開かうとしなかつた。」

[14] 文本 p.528：「漢に對する戰には出られない旨を言つてキツパリ斷つた。爾後、單于は陵に再び斯うした要求をしなくなつた。待遇は依然として變らない。他に利用する目的は無く、唯士を遇するために士を遇してゐるのだとしか思はれない。とにかく此の單于は男だと李陵は感じた。」

[15] 文本 p.529：「李陵は火影に顏を火照らせた若い蕃王の息子に、不圖友情のやうなものをさへ感じることがあつた。」

[16] 文本 p.529-530：「左賢王の戰績をひそかに氣遣つてゐる己を發見して愕然とした。」

[17] 〈答蘇武書〉《昭明文選》卷四十一 p.31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島敦卻借助單于之口及李陵的反思而對漢人虛假、繁文縟節、骨肉相殘的內亂等現象提出批評，也對漢人向來批評胡人食衣住行粗鄙一事，提出解釋，他認爲，胡人所處的自然環境屬於寒冷之地，迫使他們不得不穿厚重的皮革衣服，也不得不多食肉類以禦嚴寒，而沒有固定住屋，也是自然環境所造成的[18]。當然這種看法並非中島敦之獨創，《史記 匈奴列傳》中，司馬遷對匈奴作息、風土民情已多所著墨。指匈奴逐水草而居，無城郭，以狩獵爲業，非常時期則可立即作戰，是其天性也！食畜肉、衣皮革，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有名不諱、無姓字[19]。司馬遷更借中行說與漢使的對話來闡述匈奴被誤解的一面。例如「賤老弱」，匈奴留美食給壯丁，是爲了讓壯丁打勝戰，如此一來才能保護國內的老弱婦孺；至於「父死妻其後母」是爲了確保種族之正統，中土雖然不屑此風，但本身親族疏遠，後來甚至有相互殘殺，以致易姓之事發生；禮儀繁雜，上下交相怨；中土築城郭的結果是，人民因此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也就是戰時不熟悉戰事，平日又因工事而疲憊不堪…這些林林總總說來，豈能說漢土之俗優於胡地呢[20]？如上所言，司馬遷早已陳述過對匈奴的觀點，〈李陵〉中的匈奴論，想必也就是中島敦參考《史記》、《漢書》而來，但是中島敦卻是以李陵之口說出，這樣的寫作方式說明了中島敦致力於塑造李陵的客觀、持平的智者形象。

（5）中島敦雖然對李陵極盡辯護之能事，但對李陵的矛盾性格亦有所著墨：例如李陵家族被滅一事，李陵的矛盾個性亦是導致悲劇發生的導火線。李陵被捉之際，照一般的思維，理應自盡，但思及或可獵取單于首級將功贖罪，因而苟延殘喘下來，這點雖然深獲中島敦的理解與同情，然而李陵因擔心單于首級帶不出關，漢皇可能永遠不知，而自己可能白白犧牲，因而遲不動手[21]，而延誤了時間，以致最後受

[18] 文本 p.534
[19] 〈匈奴列傳〉《史記》卷一百十 p.2879
[20] 〈答蘇武書〉《昭明文選》卷四十一 p.2899-2900
[21] 文本 p.527：「隙があつたら單于の首でも、と李陵は狙つてゐたが、容易に機會が來ない。假令、單于を討果したとしても、その首を持つて脱出することは、非常に機会に惠まれない限り、先づ不可能であつた。胡地にあつて單于と刺違へたのでは、匈奴は己等の不名譽を有耶無耶の中に葬つて了ふこと必

漢武帝誤解而遭致滅族。其後，與蘇武見面時，見到蘇武即便無法獲得漢室的支援，對漢室依然忠心不二時，不禁對自己的「理智」開始產生質疑。另外表現出李陵矛盾個性之處，例如雖然滅族之恨令他錐心刺骨，但卻無法爲了報仇而率兵攻打漢軍；又雖然如上所述，有太多理由迫使他留在胡地，但他的精神依然無法獲得真正的安頓，終日以疲憊來麻醉自己[22]。這段描述與前文所提的李陵形象大爲不同，可以解釋爲中島敦透過李陵這個人物描述人生的孤獨與無力感。

（6）對於司馬遷的仗義執言，李陵並不領情，這也是〈李陵〉中的特殊部份。李陵認爲與司馬遷只是點頭之交，並無深厚友誼，甚至覺得司馬遷是個好發議論的傢伙，對於司馬遷爲了李陵事而受到屈辱，李陵並不特別感到愧疚[23]。畢竟，每一個人只須爲自己的生命煩憂，也只爲自己的生命負責。這部書寫公元前事件的作品，深具現代的個人主義之特色，突顯中島敦關注個人生存問題的主題。另外，這樣的一種李陵形象的塑造，其目的亦是在突顯司馬遷爲李陵辯護的舉動是純潔無雜的一種行爲，完全是司馬遷爲自己人生理念負責的舉動。

以上的李陵形象爲愛國、善戰、重情義、能理智行事，並且追求生之極限的大將，但同時又難脫悲劇英雄的命運。

2. 司馬遷

（1）中島敦筆下的司馬遷，是頭腦清晰、過於有自信、好議論、人際關係不佳、頑固之徒[24]。在《文選 報任少卿書》中，司馬遷形容自

定故、恐らく漢に聞えることはあるまい。」

22 文本 p.533：「匈奴の右校王たる李陵の心は未だにハツキリしない。母妻子を族滅された怨は骨髄に徹してゐるものの、自ら兵を率ゐて漢と戰ふことが出來ない（中略）再び漢の地を踏むまいとは誓つてたが、此の匈奴の俗に化して終生安んじてゐられるかどうかは、新單于への友情を以てしても、まださすがに自信が無い。考へることの嫌ひな彼は、イライラしてくると、いつも獨り騶馬を驅つて曠野に飛び出す。（中略）終日乘り疲れ黃雲が落暉に曛ずる頃になつて漸く彼は幕營に戻る。疲勞だけが彼の唯一の救ひなのである。」

23 文本 p.533：「司馬遷が陵の為に辯じて罪を獲たことを傳へる者があつた。李陵は別に有難いとも氣の毒だとも思はなかつた。（中略）現在の李陵は、他人の不幸を實感するには、餘りに自分一個の苦しみと鬪ふのに懸命であつた。餘計な世話と迄は感じなかつたにしても、特に濟まないと感じることがなかつたのは事實である。」

24 文本 p.517：「頭腦の明晰なことは確かとしても其の頭腦に自信をもち過ぎた、人づき合ひの惡い男、議論に於て決して他人に負けない男、たかだか強情我慢の變屈人としてしか知られてゐなかつた。彼が腐刑に遭つたからとて別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己「僕少負不羈之性[25]」，而中島敦寫司馬遷之自負，無非是要突顯生命之荒謬，因爲不久之後他即要遭遇到生命中最無法承受之重了。司馬遷認爲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命運，他雖是文人，但比當代的任何武人更具男子氣慨，因此所受的對待也理當在這樣的範疇內[26]，然而他最後受到的刑罰居然不是死刑而是宮刑，對他而言就太過荒謬了。另外，遭受宮刑之前的司馬遷意氣風發，除了因受父親的栽培、旅遊各地而累積的自信與才學之外，唯一志事的修史亦進行的十分順利，中島敦形容此時的司馬遷最是幸福[27]。中島敦寫這一段自是要述說命運的不可捉摸，因爲司馬遷的後來命運訴說了人生無常莫此爲甚的事實，當然同時，也是要突顯司馬遷其後如何不向命運低頭的勇者形象。

（2)《史記》的寫作哲學：司馬遷著重事實，他認爲中國典籍中的《國語》、《左傳》等對於事實的探求並不充份，教訓的成份通常多過事實[28]。修史應該也須書寫當代歷史，也就是過往通常爲今人述說過去的歷史，但是爲後人整理當今歷史的這個工作同樣重要[29]。第二個特色則爲「述而不作」。中島敦認爲司馬遷所謂的「述而不作」與孔子的「述而不作」的主張是不相同的，中島敦特別把項羽本紀中的一段以日文寫出，來表達司馬遷所謂的「述而不作」的本質。「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

驚く者は無い。」

25 〈報任少卿書〉《昭明文選》卷四十一 p.3160

26 文本 p.521：「常々、彼は人間にはそれぞれ其の人間にふさはしい事件しか起らないのだといふ一種の確信のやうなものを有つてゐた。（中略）司馬遷は自分を男だと信じてゐた。文筆の吏ではあつても當代の如何なる武人よりも男であることを確信してゐた。」

27 文本 p.519-520：「父の遺囑による感激が學殖・観察眼・筆力の充實を伴つて漸く渾然たるものを生み出すべく醱酵しかけて來てゐた。彼の仕事は實に氣持よく進んだ。むしろ快調に行きすぎて困る位であつた。（中略）數年の間、司馬遷は充實した・幸福といつていゝ日々を送つた。」

28 文本 p.518：「もつと事實が欲しい。教訓よりも事實が。左傳や國語になると、成程事實はある。左傳の敘事の巧妙さに至つては感嘆の外はない。しかし、その事實を作り上げる一人々々の人間についての探求が無い。」

29 同 28：「從來の史書は凡て、當代の者に既往をしらしめる事が主眼となつてゐて、未來の者に當代を知らしめるためのものとしての用意が餘りに缺けすぎてゐるやうであ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30]。」司馬遷反覆思考如此生動的寫作方式是否恰當？讓項羽栩栩如生地出現是否會違反了「述而不作」的原則？經過反覆斟酌修改後發現不爲登場人物注入生命力，則每個歷史人物不都是同個模樣嗎？最後司馬遷決意照著自己的理想來寫作[31]。

以上，中島敦寫來洋洋灑灑、慷慨激昂，當然可視爲是中島敦對自己文學創作的一種省思與自我勉勵，因爲中島敦在寫作上也經常是嘔心瀝血，呈現什麼樣的藝術觀應是中島敦最關心的寫作問題。

（3）司馬遷爲李陵仗義執言，如前言所述，並非二人友誼深厚所致，因此李陵對司馬遷的犧牲也就無太多的人情負擔了。換言之，司馬遷的挺身而出完全是單純的動機，只是遵循著自己的生命原則行事而已。這一點也從司馬遷的角度獲得印證。司馬遷面對群臣攻詰李陵時，深不以爲然，這批人的行爲以及英明的君主居然跟著起鬨的言行引起他的不愉快，雖然這種事司空見慣，但司馬遷依然無法阻止自己產生不愉快的感覺[32]。當然這樣的一段敘述無非是爲了與前文李陵部份相對應，突顯司馬遷的行爲純粹是自己的個性使然，這樣的觀點相較於中國向來的人情、義氣、友誼等傳統價值，日本作家如中島敦者，無疑地對個人能否滿足於自身生命表現一事更感興趣。

（4）對於遭受橫禍的反省：《文選》言：「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慍色。[33]」，換言之，《文選》中的司馬遷對於遭受屈辱一事以「無慍色」來處理，而中島敦筆下的司馬遷原則上也是抱持著這種態度，

30 〈項羽本紀〉《史記》卷七 p.333

31 文本 p.520：「彼は『作ル』ことを極度に警戒した。自分の仕事は『述ベル』ことに盡きる。事實、彼は述べただけであつた。しかし何と生氣潑剌たる述べ方であつたか？異常な想像的視覺を有つた者でなければ到底不能な記述であつた。（中略）違つた人間を同じ人間として記述することが、何が『述べる』だ？『述べる』とは、違つた人間は違つた人間として述べることではないか。」

32 文本 p.515：「既往を忘れたふりの出來る顯官連や、彼等の諂諛を見破る程に聰明ではありながら尚真實に耳を傾ける事を嫌ふ君主が、此の男には不思議に思はれた。いや、不思議ではない。人間がさういふものとは昔からいやになる程知つてはゐるのだが、それにしても其の不愉快さに變りはないのである。」

33 〈報任少卿書〉《昭明文選》卷四十一 p.3176

期刊資料庫

但是分析十分詳實，突顯出做爲一個知識份子的司馬遷的自省能力以及對生命本質的觀照能力。

○武帝之錯？－司馬遷認爲自己爲李陵的辯解完全出自良心之言，可是武帝卻如此地責罰他，不應該怪嗎？但是思前想後的結果，司馬遷不免體悟到，武帝是漢朝的大君主，非過往之君主所能比擬，漢朝有他所以國本不會動搖，而這樣的大君主其缺點自然也比其它君主來得大，這是無可奈何之事。

○佞臣之錯？－這些人趨炎附勢，陷害忠良，確實可惡。然而真正論及罪過，也不過是屬於次要程度；再者，自己不屑這批人的作爲當然就不宜與這批人計較，否則自己豈不與這批人同等層次？

○全軀保妻子者之錯？－這批人始終保持沉默，兩邊都不得罪，缺乏原則。但是仔細想來，這些人對自己的行爲既無反省也不自責，甚至被罵爲「全軀保妻子之臣」也可能都不在乎，對這些人生氣也沒什麼意義。

○自身之錯？－如果前面三者都不能怪，那麼是自身之錯嗎？但是他爲李陵所做之辯護都是合情合理，解說的方法也不拙劣，若要阿諛奉承，士當有所不爲。

○存在之錯？－如此一來，那剩下的就是「存在之錯」了。本身存在才有今天的恥辱發生，若是如此，則該選擇自我了斷了，但最後司馬遷選擇苟活[34]。「存在之錯」最令人感到無奈，但同時對有志之士而言，也是生命感到最清明的時刻。人生的方向也該在此刻做清楚的掌握了。

（5）司馬遷爲何受辱苟活？《文選》言：「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換言之，《文選》中的司馬遷擔心的是文采不傳於世，而中島敦筆下的司馬遷也是因爲內心有個聲音要他活下去，那就是完成未竟之業－史書的寫作。不過究其理由倒也不是因爲須遵守父親的遺志，也不是對這個工作有使命感，更不是如《文選》中所謂的「立言」的問題。而純粹是對工作有一種「無意識」的關心，一種彷彿是肉體上的牽繫

[34] 文本 p.522-5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般的感情[35]。這是怎樣的一種情感呢？換言之，即是一種對工作純粹的喜悅，無任何功利的因素或不得不爲的消極因素存在。在遭受橫禍的一年後，司馬遷感受到的生之喜悅並非來自生命之存活而是來自寫作[36]。這一點可看出中島對人生純粹性的堅持，以及中島敦自身因寫作而獲取的生之喜樂。

以上有關司馬遷方面的描述，呈現出來的是中島敦的寫作的藝術觀，以及身爲藝術家的宿命，還有，中島敦對純粹無雜的人生的肯定。

3. 蘇武與李陵的互動

（1）中島敦透過李陵之口對蘇武的描述是，與李陵在朝爲官的蘇武本就是一名硬漢[37]。置身北海無人知曉，也絲毫看不到返回漢土的機會，而且環境又極端惡劣，在這種情況下，蘇武爲何獨留於世?難道是爲了向命運宣戰[38]? 李陵昔日因擔心即便獵取了單于首級也無法脫離胡地而最終放棄了行動，今日面對蘇武的「徒勞」之舉，著實令李陵震憾不已[39]。

面對李陵，蘇武時露憐憫之情，最是叫李陵感到畏懼。雖然李陵身穿華服，而蘇武衣衫襤褸，李陵爲官而蘇武爲囚，但是這些外在形式均無法讓李陵佔上風。反倒蘇武的骨氣愈發彰顯出李陵的心虛[40]。

---

[35] 文本 p.524-525：「その仕事への無意識の關心が彼を自殺から阻む役目を隱々の中につとめてゐたことに氣がついた。（中略）とにかく此の仕事のために自分は自らを殺すことができぬのだ（それも義務感からではなく、もつと肉體的な、此の仕事との繫がりによつてである）といふことだけはハツキリしてきた。」

[36] 文本 p.526：「悽慘な努力を一年ばかり續けた後、漸く、生きることの歡びを失ひつくした後も尚表現することの歡びだけは生殘り得るものだといふことを、彼は發見した。」

[37] 文本 p.535：「確かに稀に見る硬骨の士であることは疑ひないと陵は思つてゐた。」

[38] 文本 p.537-538：「「此の男は何を目あてに生きてゐるのかと李陵は怪しんだ。いまだに漢に歸れる日を待ち望んでゐるのだらうか、蘇武の口うらから察すれば、今更そんな期待は少しももつてゐないやうである。それでは何の為に斯うした慘憺たる日々をたへ忍んでゐるのか？（中略）誰にもみとられずに獨り死んで行くに違ひない其の最後の日に、自ら顧みて最後まで運命を笑殺し得た事に滿足して死んで行かうというのだ。」

[39] 文本 p.538：「人に知られざることを憂へぬ蘇武を前にして、彼はひそかに冷汗の出る思ひであつた。」

[40] 文本 p.539：「蘇武の己に對する態度の中に、何か富者が貧者に對する時のやうな－己の優越を知つた上で相手に寬大であらうとする者の態度を感じ始めた。（中略）繿縷をまとうた蘇武の目の中に、時として浮ぶかすかな憐愍

臺灣大學學術

李陵「不得已之情」，本應可獲得諒解，但因蘇武的存在，而令這「不得已之情」變得站不住腳。因此，蘇武的存在對李陵而言，是崇高的訓戒，同時也是令人焦燥的一場惡夢[41]。武帝崩，蘇武南向號哭。原本以爲蘇武留在北海只是因爲個性倔強，但李陵從蘇武的舉動中發現蘇武感情真摯，即使蘇武的遭遇不若李陵悲慘，但是其弟兄也未獲朝廷禮遇，整體而言，受於漢朝的恩澤並不多，但蘇武的表現卻令人覺得不可思議[42]。李陵因此不得不開始懷疑自己的作爲了[43]。

（2）《漢書》中李陵曾對蘇武勸降，但〈李陵〉裡卻描寫李陵因心虛、矛盾與愧疚，以致自始至終都未能對蘇武開口[44]。中島敦筆下的李陵一直處於矛盾、不安與羞愧當中，也由此更能看出李陵具有高度的反省能力。另外在《漢書》中提及李陵在與蘇武會面時即將蘇武母死妻改嫁的實情一五一十告知蘇武，但〈李陵〉中對妻子改嫁一事卻有所保留[45]。這裡更是述說了李陵感情細膩的一面。

以上針對三個人物所做的分析，可得出的結論爲李陵是個英雄但同時卻也有生存上的種種矛盾；而司馬遷是能在困境當中清明地尋找出方向，有所堅持的藝術家；至於蘇武則是「徒勞之美」的體現者，這三人既然同台演出，可見在中島敦心目中的份量無分軒輊。究竟中島

の色を、豪奢な貂裘をまとうた右校王李陵は何よりも恐れた。」

41 文本 p.539-540：「李陵自身、匈奴への降服といふ己の行為を善しとしてゐる譯ではないが、自分の故國につくした跡と、それに對して故國の己に酬いた所とを考へるなら、如何に無情な批判者と雖も、尚、その「やむを得なかつた」ことを認めるだらうとは信じてゐた。所が、ここに一人の男があつて、如何に「やむを得ない」と思はれる事情を前にしても、斷じて、自らにそれは「やむを得ぬのだ」といふ考へ方を許さうとしないのである。（中略）蘇武の存在は彼にとつて、崇高な訓戒でもあり、いらだたしい惡夢でもあつた。」

42 文本 p.540：「その純粹な烈しい悲嘆には心を動かされずにはゐられない。（中略）譬へやうも無く清冽な純粹な漢の国土への愛情（それは、義とか節とかいふ外から押しつけられたものではなく、抑へようとして抑へられぬ、こんこんと常に湧出る最も親身な自然な愛情）が湛へられてゐることを、李陵は始めて發見した。」

43 文本 p.540-541：「李陵は己と友とを隔てる根本的なものにぶつかつていやでも己自身に對する暗い懷疑に追ひやられざるをえないのである。」

44 文本 p.539：「李陵は單于からの依囑たる降服勸告については到頭口を切らなかつた。蘇武の答は問ふ迄もなく明らかであるものを、何も今更そんな勸告によつて蘇武をも自分をも辱しめるには當らないと思つたからである。」

45 文本 p.537：「陵は蘇武の母の死んだことだけは告げたが、妻が子を棄てて他家へ行つたことは流石に言へなかつた。」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敦安排這三樣人生的意圖爲何？在接下來的章節中將探究中島敦的創作意圖。

三、〈李陵〉主題

（一）〈李陵〉誕生的背景

1 中島敦漢學教養深厚。因此有能力查閱中國古籍，並以此爲題材。

2 父親任教大連第二中學時，中島敦常前往大連及北方旅遊。這一點應是對他親近中國，及了解中國方面有所影響。

3 可能受昭和十四年五月發生的諾門坎（ノモンハン）事件的影響。在滿州國西部國境諾門坎地方，日滿與蘇蒙發生疆界紛爭，經過數月的激戰，日本第二十三師團被殲滅（9 月 16 日雙方簽定停戰協定）[46]。這樣的情節與李陵兵敗，以及〈李陵〉故事背景發生在北方等情景十分雷同。當然中島敦在「章魚木の下で」中提及自己如何地不關心政治，以及文學不可被拿來服務政治…等等[47]，但是相信中島敦不可能不知道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

4 與長篇小說〈北方行〉有關。〈北方行〉以一九二 O 年代變動的中國爲背景，敘述個人「存在的不確定性」及日本與中國的民族意識等問題。換言之，〈北方行〉可視爲〈李陵〉之作的先行作品。

5 與李陵伯父的著書《蒙古通志》有關。中島敦勢必是受到伯父的啓發而有〈李陵〉之作。

6 與體弱多病，但又充滿寫作意欲的遭遇有所關連。照中島夫人的說法，中島敦臨死前還充滿了寫作意願[48]。由於本身無法克服身體的極限，因此對於能活下去，戰到最後一分一秒的人生態度自有一份

---

[46] 「二十日、ソ・モ軍は日本軍の予期しなかった大攻勢に転じ、日本軍は各所に分断包囲あるいは彼の主張する国境線外に撃退され、包囲された部隊の多くはほとんど全滅の損害を生じた。」 《国史大辞典》11 吉川弘文館 p.435-436

[47] 〈章魚木の下で〉(《中島敦全集》第一卷 筑摩書房 1989.5）p.549-551

[48] 中島タカ〈お禮にかへて〉(《中島敦全集》第一卷月報〈ツシタラ 4〉 文治堂書店 昭和 35.11） p.22-23 「好きな本も、芝居も、見ることが出来なくなり、書くことも出来なくなると、「書きたい、書きたい。」と涙をためて申しました。「もう一冊書いて、筆一本持って、旅に出て、参考書も何も無しで、書きたい。」「俺の頭の中のものを、みんな吐き出してしまいたい。」とも申しました。」

認同感與欽羨之情。

7 有關「生存」的問題一直是中島關心的文學主題。如〈狼疾記〉的「對存在感到不安」(「存在への疑惑」「漠然とした不安」)、〈光と風と夢〉中的「燃燒求生的意志」、〈文字禍〉的「存在的不確定性」(「あらゆる存在の不確かさ」)、〈山月記〉的「命運的不可解」(「存在の不条理性」)等等。〈李陵〉也是一部承續過往主題的作品。

8 對「葉隱精神」提出質疑。《葉隱》[49]主張「武士道乃是死得其所…唯死是誠」(「武士道というは死ぬ事と見付けたり」、「死のみ誠である」…)。另外,昭和十六年一月(一九四一)陸軍大臣東条英機針對內部宣達戰場軍人行動準則,也就是頒布所謂的〈戰陣訓〉,文中提及「常思鄉黨家門之顏面」「勿生受虜囚之辱,死而留罪禍污名」等強調精神主義以及徹底否定俘虜的「寧爲玉碎」的主張[50]。然而,中島敦的〈李陵〉中的三個人物均忍辱偷生而沒有選擇自殺,這樣的題材選擇,恐怕不是巧合。

9 受到夏目漱石〈倫敦塔〉(幽閉人生)的影響?根據德田進氏的說法,中島敦可能受到夏目漱石〈倫敦塔〉的影響才有此作。〈倫敦塔〉描寫夏目漱石根據十六世紀英國的囚犯,在監獄牆上所留下的塗鴉,而發展出的種種思維。德田進氏認爲〈李陵〉中的李陵及蘇武受困於長城之北;司馬遷則是先有牢獄之困,後又因宮刑而自絕於人群,被囚於監獄之中,確實三人均過著幽閉的人生。這樣的三種人生與〈倫敦塔〉中的人物十分雷同,想必是受到夏目漱石的〈倫敦塔〉的啓發[51]。這一點與上述的第 3 點諾門坎事件及第 8 點〈戰陣訓〉的內容,同屬不可考,因爲從中島敦的創作中都未尋找到任何有關這方面的敘述,純屬可以理解的推測而已。

(二)主題

對於「李陵」這篇作品,向來的研究即十分熱絡,茲整理如下:

---

[49] 《葉隱》:正式名爲《葉隱聞書》,共十一卷,完成於 1716 年。被視爲是武士的修養之書。

[50] 「常に郷党家門の面目を思いひ」、「生きて虜囚の辱めを受けず、死して罪禍の汚名を残すこと勿れ」 《国史大辞典》8 p.441

[51] 《小說〈李陵〉新考》(ゆまに書房 平成 8.8) p.212-2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　著重在對古籍－《史記列傳》、《漢書》、《文選》、王維詩句－的分析[52]

2　透過對匈奴歷史的分析來探討中島敦書寫〈李陵〉的動機[53]

3　以李陵變文與記紀ヤマトタケル説話進行比較[54]

4　李陵乃是太平洋戰爭期間身體健康不佳的中島敦的自我投影之說[55]

5　李陵、司馬遷、蘇武三人的反骨精神[56]

6　存在的不確定性[57]

7　喪失自我後的更生[58]

8　描寫幽閉的人生[59]

9　挑戰命運的捉弄[60]

10.觀察在命運操縱下的生存的悲哀[61]

11.追求生存的極限[62]

在分析這些先行研究之前，宜先對這部作品的主人公之設定問題進行一番釐清。有關作品取名的問題，深田久彌在中島死後，認爲應該儘量不加入主觀，而選擇了素淡的〈李陵〉的這個題名，雖然後來在中島敦〈斷片三十〉的雜記中發現了「漠北悲歌」四個字，但又發現中島在它處將「漠北悲歌」四字劃掉；再者，深田氏等人也認爲畢竟三個人物中對李陵的描繪最完整，所以最後定名爲〈李陵〉[63]。的

---

[52] 佐々木充〈《李陵》―運命への問い－〉(《中島敦の文学》桜楓社　1973.6)、徳田進《小説〈李陵〉新考》(ゆまに書房　平成 8.8)、国岡彬一〈漢書から見た李陵〉(《文治堂版中島敦全集第二巻月報ツシタラ 5》)、護雅夫《李陵》(中央公論社　昭和 49)

[53] 徳田進《小説〈李陵〉新考》(ゆまに書房　平成 8.8)、林幹《匈奴通史全》(中國國立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54] 川口久雄の論文（文学四一－二）

[55] 三好行雄、瀬沼茂樹《李陵・山月記》(新潮文庫　昭和 44.9)

[56] 徳田進《小説〈李陵〉新考》(ゆまに書房　平成 8.8)

[57] 鷺只雄〈中島敦―そのエスキス）　《中島敦論―＜狼疾＞の方法―》有精堂 1990.5　「自我の形成期における生の状況から中島は複雑な屈折した精神構造をもち、作品はいずれも自我や人間存在の不条理を追及」

[58] 同 55。

[59] 徳田進《小説〈李陵〉新考》(ゆまに書房　平成 8.8)

[60] 李碗玉《中島敦作品中的人與命運》(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

[61] 鄭清茂〈中島敦における中国史〉(《季刊芸術》第二十二号　1972.7)

[62] 佐々木充〈中島敦〉　(《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講談社　昭和 59.10)　p.1050

[63] 深田久彌〈中島敦の作品）　(《近代文学鑑賞講座 18　中島敦・梶井基次郎》

臺灣大學學術資料庫

確，從〈李陵〉中描述三個人物，說是書寫三樣人生也不爲過，但是寫這三樣人生中，卻以李陵爲開頭又以李陵爲結尾，而且不管是司馬遷的部份還是蘇武方面都由李陵貫穿而成，尤其蘇武的人物造型，完全是透過李陵的「觀察」而來的；蘇武與司馬遷之間則完全沒有交集。因此，視李陵爲〈李陵〉的主人公應有其合理之處。由於本論文所採取的是以李陵爲主人公的立場，因此在上文的中日文獻上也完全鎖定在李陵形象的分析上。

前述的「先行研究」中仍存在著一些問題。例如有關李陵變文的問題，李陵變文究竟是否出自李陵之手，仍有爭議，有研究指出五言詩是李陵之後才出現的詩體，李陵變文可能是後人之作。由於這個研究仍存在著爭議，故本論文捨棄這個研究角度。

另外就是「存在的不確定性」:（あらゆる存在の不確かさ、存在の不条理性）的這個觀點，的確三個人的人生轉變都是始料未及的，充滿了錯愕與無奈，但是，無可否認這個論點過於偏重在對三人遭遇的描繪，而忽略掉他們最後爲自己的人生所採取的立場。「存在的不確定性」是要強調人的命運如何地慘遭撥弄，如此一來，司馬遷與蘇武的最後作爲不就顯得畫蛇添足了嗎？

反骨精神的表現：三人的確都向權威挑戰，李陵數度違反上意（武帝、單于、哀帝），司馬遷不畏武帝與當朝重臣，蘇武更是無懼單于，若謂〈李陵〉的主題是表現反骨精神，實不爲過。甚至此處的反骨的對象可視爲是「死亡」，三人都在死神降臨時昂首闊步選擇存活之路，是一種徹底的反骨精神之表現。然而，從李陵的最後內心的掙扎這一點看來，可以了解原來李陵一路走來並不是坦蕩無礙，反而對人生有諸多的懷疑與反省，換言之，若論及其反骨精神，則可發現李陵的反骨精神喪失了理直氣壯的部份。這個詮釋也同樣適用於「挑戰命運的捉弄」的觀點上。因爲特別是在李陵的部份，由於充滿了無奈與疑懼，終了瀰漫出哀愁的氣氛，因此不宜選擇過於正向的主題詮釋。

喪失自我後的更生：這個論點適用於詮釋司馬遷的立場，但不適用於整體，尤其是李陵部分，其結局充滿了悲涼氣氛，因此說最後獲

角川書店　1959.12）　「出来るだけ私の主観を入れない。淡白な題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得新生，似有不合理之處。

李陵乃是太平洋戰爭期間身體健康不佳的中島敦的自我投影之說：在前文中，筆者也強調過將本作品之主人公設定爲李陵，因此對於李陵乃是中島敦之投影的說法，筆者原則上沒有異議，但是若過於強調李陵是戰爭期間健康狀況不佳，對人生感到無奈的中島敦之投影，則作中的司馬遷及蘇武又代表中島敦的哪一種特質呢？此二人堅定自己的人生方向，很難被認定是中島敦的無奈心境的投影。文中二人所佔篇幅也不少，因此此論點是否忽略到二人的存在意義了？

至於「觀察在命運操縱下的生存的悲哀」這一點，則與前面的「生存的不確定性」同樣，過於強調消極、無奈的一面，司馬遷與蘇武的人生並不能以一句「生存的悲哀」即能詮釋。司馬遷固然埋怨過命運，但發憤圖強的部分卻不能被忽視；而蘇武更是活得理直氣壯，讀者從局外人的立場來看，或許感受到生存的悲哀，但是這一點我們卻無法從蘇武的立場獲得印證。

筆者試著從幾個觀點來探討主題。 從年譜上可以了解中島敦的人生困頓，以及輾轉多年後終於下決心要走創造的這條路，但身體已不堪負荷，然而雖在這樣的「人生的極度困頓」當中，中島敦選擇的居然不是如櫻花般凋零的生死觀，而是排除萬難地活下去，例如遠離文藝重心的東京，前往帛琉養病兼構思寫作。就如〈李陵〉作中的三人，這三人絕非貪生怕死之徒，每個人都有赴死的決心，但最後都選擇「苟且偷生」，這在日本文化裡頭，以及日本文學的主流意識中，誠屬異類。也可以說中島敦的生死觀是善盡人生的每一時刻，追求任何可能性的一種人生態度。因此上述先行研究的第 11 點所謂的「追求生存的極限」的這個觀點，筆者也深表同意。當然從李陵的種種心思來看，中島敦的生死觀也絕非十足的正面思維，他是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忠實地反映了人生，也才有李陵不安與徬徨的忠實呈現。

李陵雖然選擇存活，但是內心始終無法平靜，何以李陵選擇「追求生存的極限」後，依舊無法獲得心靈上的安頓？中島敦不提蘇武在胡地娶妻生子一事，也不提司馬遷其實可以花錢除罪，其目地就是要設定二人的「純粹人生」、「勇者形象」，這二人所扮演的角色各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司馬遷是李陵所欠缺的「諦觀與決心」，而蘇武則是不容許李陵在人生「正直」層面上打馬虎眼的一個訓誡。司馬遷堅持自己的藝術觀，並且在經歷災難之後體悟到一切乃是生存之惡，那麼剩下的人生課題便是如何傾力爲這荒謬的人生點綴色彩了，這就是李陵所欠缺的「諦觀與決心」。而蘇武扮演的角色，就如第二章節中所述，他時時提醒李陵反省人生的「正直」問題。李陵以爲可以自圓其說，但是看到蘇武的「徒勞」之舉，他才深刻體悟到不必別人指責，連自己都無法故意忽視自身心虛的部分。相對於前二人的「勇者」形象，李陵卻有正常人的欲望、矛盾與憂愁，而所謂的矛盾與憂愁的產生正是自己自省能力所致。當李陵排除萬難努力地選擇存活下來的同時，如何活得理直氣壯，活得有方向，正是其苦惱之處。換言之，中島敦欲藉李陵的角色，說明在「追求生存極限」的積極作爲中，如何兼顧「正直」是生命的難處，也是人生的最大課題。誰說選擇「瓦全」要比「玉碎」來得容易？誰說努力存活、追求極限，即表示人生無憾？我們看到了中島敦是如此熱情、正直而且嚴肅地看待自己的生命。

或許過於專注於中島敦〈李陵〉的分析，在比較中日文學中的李陵定位上有失周延性，因此在下一章節中將參考中日的古文獻，來審視李陵在文學上的形象意義，以及中島敦〈李陵〉在李陵形象中所佔的地位。

四、中日文學中的李陵形象

（一）中國

李陵在中國歷史上雖然還不到被視爲是偉大的英雄人物的地步，但是由於是漢朝著名的飛將軍李廣的孫子，再加上降胡一事也算是歷史上的一樁大事，而且還因此牽連司馬遷遭受宮刑之辱，因此自古以來討論李陵的文章即不在少數。光是查閱四庫全書中的「集」、「子」、「史」等，即可找出一百七十餘文記載李陵，以下僅將相關文章做簡單分類，並引述其中立場較爲明確者。

1　站在護衛李陵的立場者，首推《史記》與《漢書》。《史記》記載李陵兵敗被俘的事蹟，《漢書》的基本態度同於前者，但更爲詳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爲其中又以諸多章節對李陵表達同情，總體而言，二者對李陵是持較正面的態度來看待。另外《昭明文選》中則有司馬遷讚譽李陵的一段文章。除此之外，各個朝代也陸續出現袒護李陵的作品，其中較有名的是王維的「李陵詠」[64]，王維對李陵的英勇事蹟以及事與願違的無奈遭遇描述詳盡。明 梁簡在《畦樂詩集》中有一文題名爲＜行路難＞，讚譽李陵爲古奇士，一心報國，卻得不到君王的信任，遭遇不幸，令人不勝欷歔等等。清 朱彝尊在＜弔李陵文＞中，雖認爲李陵負才喜功才招致敗戰，但對其文采十分賞識，認爲帝不善用，爲世所惜。其他也有爲數不少的作品，站在這樣的立場來論述。

2 對李陵極盡討伐之能事者，首推白居易。白居易在「漢將李陵論」[65]一文中提到忠、孝、智、勇四者，爲人爲子之大寶，而李陵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白居易甚至對司馬遷與班固論及李陵時無明譏之舉，頗有微詞。另外，宋 王叡也在＜誠節論＞中提及李陵，認爲不能杖節死義、不能變通成功，謂之偷生無恥之夫。同樣，宋 陳傅良在〈使功不如使過〉一文中，也認爲李陵因爲向來極少失誤以致引來最後的落敗，所以爲人君者應重用曾出過差錯之士，因爲這些人才能戒慎恐懼而小心行事。同爲宋代作家的詹初在〈日錄下〉一文中，更是露骨表達反感：「**李陵降匈奴時 分明是畏死 後來答蘇武謂別欲立功以圖報國 此全是矯飾之言 人臣之功 非成事即死事 既不能成事 又不能死事 除此之外 更何功可立**」[66]。

3 另一種觀點，既不是貶抑李陵，也非爲其仗義執言，而是站在同情李陵之遭遇者。《全唐詩》中有諸多類似的作品，例如李白的〈千里思〉[67]、胡曾的〈交河塞下曲〉及〈李陵臺〉[68]、徐夤〈恨〉[69]等。

---

64 王維《王右丞集箋註》（河洛圖書出版 1975.3） p.80
65 白居易《白居易集第三冊》（中華書局 1979.10） p.980
66 《寒松閣集》卷二 p.1179-11
67 「李陵沒胡沙，蘇武還漢家。迢迢五原關，朔雪亂邊花。一去隔絕域，思歸但長嗟。鴻雁向西北，飛書報天涯。」
68 「交河冰薄日遲遲，漢將思家感別離。塞北草生蘇武泣，隴西雲起李陵悲。」、「北入單于萬里疆，五千兵敗滯窮荒。英雄不伏蠻夷死，更築高臺望故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了宋、元[70]、明、清等朝代也出現不計其數的文人騷客以〈李陵臺〉或〈李陵臺懷古〉或〈李陵別蘇武〉等等詩名，來憑弔李陵。其中不乏藉李陵之遭遇而抒發自己困頓之文章[71]。

總體而言，中國文獻對李陵的敘述，與蘇武及司馬遷相較，毫不遜色，由於是爭議性人物，所以對之持正、反態度者的比例不相上下，即便到了近代，袒護者有之，視之爲民族恥辱者有之，甚至連帶責怪起司馬遷者也不乏其人[72]。而另外較特殊的是 1994 年崔明德氏所寫的《李陵》[73]，是一部蒐集了正史、文集、敦煌變文、考古資料以及歷代的評論而寫舊的李陵傳記，是在考察李陵方面較具學術價值的資料。

（二）日本

日本文學作品自古典以來，提及李陵事蹟者甚少。主要的理由當然是因爲李陵對日本而言，只不過是個他國人物，論其功績也不若孔孟、老莊或朱子學等中國哲學對日本思想、文化的影響，而且又是降將，對崇尚民族精神的日本而言，李陵事件反而是負面教材。基於這些理由，在日本文獻上少見李陵之記載，也是可以理解之事。在此僅覓得數項資料。

1　曹植怨深蘭路月。李陵夢絕柳營秋。(「愁人夜不眠」)[74]

2　李都尉思霜中動。班婕妤詞雪裏生。鄉國可迷霜一色。閔河不限雪千程。(「詩情被月催」)[75]

3　聯句出於栢梁。五言成於李陵。自漢至宋。四百餘載。(「詩境記」)[76]

4　幾行胡鴈之聲。蘇將軍之詞可聽。雙飛梁鷰之翅。李都尉之思猶

[69] 「事與時違不自由，如燒如剌寸心頭。烏江項籍忍歸去，雁塞李陵長繫留。」
[70] 以元朝陳宜甫的作品（〈過交河作〉）爲例「北去李陵經幾秋 築臺憔悴望鄉愁 可憐隴右天窮處 不見交河只淚流」
[71] 例如宋 蕭華在〈謝試秘書少監陳情表〉中，謂李陵之所以苟且偷生乃是希冀他日能將骸骨歸死朝廷，而自己也有相同的意願，希望獲准返回故鄉田園……。
[72] 李蕾、甄翠娥〈司馬遷對李陵之降的辯護有失偏頗〉(《黑龍江社會科學》 1997 年第 6 期) p.71-72。除此之外，中國大陸的近代，特別是在五、六〇年代之前，謾罵李陵的文章屢見不鮮。
[73] 崔明德《李陵》(文津出版 1994.9)
[74] 〈資實長兼兩卿百番詩合〉(《群書類從》第九輯 p.303)
[75] 〈泥之草再新〉(《群書類從》第九輯 p.308)
[76] 〈朝野群載 卷第三 文筆下〉(《國史大系》29 上 p.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深[77]

5 同李陵之入胡 但見異類 似屈原之在楚 眾人皆醉（「鶴」）[78]

從上文詩句中可約略理解，除了記載五言詩成立於李陵時期的這一句客觀描述之外，其餘詩句多爲揣測李陵孤獨心境，或悲憫其懷才不遇之作，整體而言，對李陵多表同情之思，更沒有對李陵降胡之事進行道德批判，或者爲其辯解。若以上述中國文獻的三項分類來看，日文文獻較符合第三項的特色。另外，除了上述詩句之外，在一般小說、散文中所述之李陵，也多是記述到司馬遷，或是胡、漢相爭的一段歷史時才順帶被提及。武田泰淳所寫的「司馬遷」即是當中的一例。另外日本中世的戰紀文學《平家物語》(覺一本)，卷二有一章節爲「蘇武」，記述源平之亂，康賴入道被放逐於鬼界之島，康賴想念京城，於是製作千座卒都婆（佛塔）使漂流於海上，結果其中一座漂流到安藝國嚴島的大明神社前，爲康賴舊識的一個僧侶所拾，結果輾轉送回京城，大家嘖嘖稱奇，也因此連想到中國過去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也就是蘇武北海牧羊，依賴飛雁送回家書，後終於獲救的故事。在提及蘇武之前，對李陵有一段說明，大意爲漢皇派遣李少卿率領三十萬騎兵攻打匈奴，兵敗被俘，漢皇於是再派遣蘇武率領五十萬大軍再次出擊，也同樣事敗被捕，並被削足…..《平家物語》的內容主要是爲了證實康賴之傳奇故事有其可信度，所以特意引用中國的故事來佐證，這當中不符史實的情節雖多，但由於重點不在對史實的探討，因此本論文即不再深入追究這個問題。

日本作家雖然常以中國的作品或歷史人物爲寫作題材，不過針對李陵而言，大多只是當作抒發情感時的一個參考例子而已。但正因爲如此，由上述的文獻來看中日文化之比較，似乎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不同於中國文化特別強調「民族主義」、「忠義」甚至「正義伸張」，或者藉李陵之遭遇來抒發自己懷才不遇之憂愁等層面，日本文學具有脫政治性與意識形態的特色，其所關注的毋寧是個人生存上的

[77] 〈本朝文粹 第三 對冊〉(《國史大系》29 下 p.69-70)

[78] 〈和漢朗詠集〉(《日本古典文學大系》73 p.162-163)。宋朝李昉等編的《文苑英華卷一百三十八》中，也有類似的描述：「同李陵之入蕃誰爲同志 似屈原之在楚眾人皆醉」(皇甫湜 「鶴處雞群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定位問題，而中島敦的〈李陵〉更是詳實呈現此特色的作品。特別，〈李陵〉廣受日本讀者的青睞，其中一個理由就是日本文化中存有「同情弱者」的意識，雖然日本歷代文學述及李陵者不多，不過也可看出大部分的文獻都對李陵寄予同情之思。日文中有「判官びいき」這個詞，說明了落難英雄往往是最具魅力的事實。從文化的層面來看，中島敦的〈李陵〉可說反映了日本民族的這種深層意識。而除了遵循這種傳統意識之外，中島敦筆下的李陵及其他二人致力追求生存之極限，這種態度也與日本傳統的櫻花式凋零的生死觀，包括類似「戰陣訓」所示的「玉碎」態度大異其趣，這些都說明了中島敦〈李陵〉的獨特之處。

文本：〈李陵〉(《中島敦全集》第一卷 筑摩書房 昭和 51.3)

附錄 I ：中島敦年譜

1 明治 42（1909）年 5 月 5 日，出生於東京，祖父、伯父們、父親均爲漢學者。祖父著《演孔堂詩文》上、下二卷、《性說疏義》上、下二卷；大伯父靖開漢學堂；二伯父端，號斗南，著《支那分割之命運》等。

2 大正 9（1920）年，父親任教於朝鮮京城的龍山中學，敦進龍山公立小學五年級。

3 大正 15（1926）年，父親擔任關東廳立大連第二中學教職，敦自京城中學畢業，成績優異。

4 昭和 5（1930）年，東大文學部國文學科入學。大學期間僅著〈斗南先生〉。

5 昭和 7（1932）年，結婚；前往南滿州、中國北部旅行。

6 昭和 8（1933）年，東大畢業，畢業論文「耽美派の研究」；同年進研究所就讀，研究題目爲「森鷗外の研究」；日本經濟蕭條，靠父親關係進入橫濱高等女校從事教職，擔任漢文、英文課程。

7 昭和 9（1934）年，因健康理由，研究所中退；氣喘發作，性命一度垂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8 昭和 10（1935）年，廣讀《莊子》、《列子》。

9 昭和 11（1936）年，旅遊上海、蘇州、杭州；廣讀《韓非子》、王維、高青邱。11 月完成〈狼疾記〉；12 月完成〈かめれおん日記〉

10 昭和 15（1940）年，伯父竦去世，留有《蒙古通志》等著書。

11 昭和 16（1941）年 1 月完成〈光と風と夢〉；7 月前往帛琉（パラオ）擔任南洋廳國語教科書編集書記，水土不服，氣喘發作，寫作中斷；收集南國資料成爲後來的〈南島譚〉素材。

12 昭和 17（1942）年 2 月，受文壇前輩深田久彌推薦，〈古譚〉登於《文學界》二月號；3 月回國，始知在國內已逐漸建立起名聲。〈光と風と夢〉刊登於《文學界》五月號，被文壇喻爲芥川龍之介之再世，中島也決意走專職作家之路。10 月下旬完成〈李陵〉，12 月 4 日氣喘發作過世，享年三十三歲。

13 昭和 18（1943）年，深田久彌將〈李陵〉刊登於《文學界》七月號。

14 昭和 19（1944）年，《李陵》中譯本問世（盧錫熹譯，上海太平出版公司）。

15 昭和 51（1976）年，筑摩書房出版《中島敦全集》三卷。

16 死後遺留有小說二十餘篇、七百多首短歌、漢詩二十五篇及若干翻譯、紀行文。其中以中國古典爲題材的作品，除了〈李陵〉之外，尚有〈悟浄歎異〉（昭和 14）、〈山月記〉（昭和 17）、〈悟浄出世〉（昭和 17）、〈名人伝〉、〈弟子〉（昭和 17）等。其它以近代中國爲素材的有〈斗南先生〉（昭和 7）、〈北方行〉（昭和 12）等。

17 在世期間，遭遇生母、兩位繼母、兩位弟弟、一位妹妹、伯父斗南、長女之死，死亡對中島敦來說決不陌生[79]。

附錄Ⅱ：〈李陵〉創作的相關資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9] 年譜參照《中島敦全集》（文本）以及〈中島敦〉（《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講談社 昭和 59.10）

1 根據〈李陵〉的內容及《中島敦文庫》(神奈川近代文學館、日本大學法學部圖書館所藏)的藏書，推論〈李陵〉的直接引用文獻有《史記 李將軍列傳》、《史記 匈奴列傳》、《史記 太史公自序》、《史記 項羽本紀》、《漢書 李廣蘇建傳》、《漢書 匈奴傳》、《漢書 司馬遷傳》(以上收錄在《四部叢刊 百衲本二十四史 《史記》、《漢書》)。間接文獻有《史記 漢武帝本紀》、《漢書 漢武帝本紀》、《文選 李少卿答蘇武書》、《文選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漢文叢書 史記一》、《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支那通史 上冊》、《世界歷史大系第三卷 東洋古代史》。後四卷爲中島敦提供了漢代、前漢代的中國的典章制度等資訊。

2 另外，可能也參考了《蒙求》(據傳爲唐代李翰所作，內有「李陵初詩」、「蘇武持節」等)、《平家物語－蘇武》等資料。只不過，「李陵初詩」之作者身份有待商榷，因此本論文不特別提及這個部份。

3 根據中島敦父親田人氏所作的〈中島敦年譜〉－「帝大畢業後、即執教於私立橫濱高等女學校。九年來、在執教之餘、鑽研英文學及中國文學、(英文學方面、研究何物、不詳)中國文學方面、尤愛左傳、韓非子、莊子、及列子。詩方面、則傾倒於王摩詰及高青邱。[80]」等的敘述而推論出〈李陵〉中的修辭可能受到王維及高青邱等二人詩句之影響。

附錄Ⅲ：敘事詩之美

〈李陵〉一作充滿了悲壯美及韻律美。就敘事詩之特質而言，〈李陵〉堪稱上乘之作。根據上文主題的分析可以了解，悲壯美的營造，主要來自中島敦的中心思想，其次就是文句與音節的搭配。文句方面，在前文年譜中曾提及中島敦愛讀王維、高青邱兩位詩人的作品，於是從兩位詩人的詩作中尋找影響〈李陵〉創作的痕跡。

王維的〈老將行〉主要在描述李廣勇武過人，轉戰沙場，後卻因運氣不佳而未能立功，終了被棄的經過。「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

[80] 斉藤勝《中島敦書誌》和泉書院　平成 9.6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得胡馬騎…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自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81]」。中島敦在書寫李陵的祖父李廣的際遇時，想必受到王維對李廣之情感所影響。另外，有關描述異域景緻者則多受高青邱的熏陶。例如〈李陵〉中五千兵士深入險峻胡地時的一段悲涼描述：「朔風は戎衣を吹いて寒く、如何にも*万里孤軍来るの感が深い*」。這一段描述可由高青邱的〈薊門行〉中找到原典：「行行光祿塞 望望單于臺 天寒水草盡 *萬里孤軍來* 中國多荒土 窮邊何用開[82]」。這一段漢詩也見於中島敦的雜記本「年代未詳[83]」上。其中「朔風は戎衣を吹いて寒く」一句也與「三月戍袍寒 朔雲捲胡風」的寫法相仿。還有〈李陵〉中描寫天狼星發出光芒，暗示匈奴即將攻來的一句[84]也可由高青邱樂府〈將軍行〉看出[85]。其它的自然景物的描寫，例如月光與霜，在〈李陵〉中的內容爲「浚稽山の陣を撤する時は夜が暗かつたのに、又も月が明るくなり始めたのである。月光と満地の霜とで片岡の斜面は水に濡れたやうに見えた。[86]」這依然可由中島敦的雜記上發現他在閱讀高青邱詩作時所寫下的筆記，而從中循線找到高青邱樂府〈聞角吟〉的「霜似水」的詩句[87]。總體而言，〈李陵〉中有關邊塞荒涼景物，或者作戰時的悲壯氣氛，以及胡地特有的風土等均可見到高青邱對〈李陵〉的影響。另外就是德田進氏分析〈李陵〉的音節，而對〈李陵〉具有「國語音調美」多所讚譽[88]。例如在〈李陵〉的序曲文中多七五調、七六調及七七調，這樣的音節正可蘊釀出李陵悲壯的行軍氣氛；在打探軍

[81] 王維〈老將行〉(《中國文學欣賞全集》莊嚴出版 民國 74.11） p.3566
[82] 〈薊門行〉(《續國譯漢文大成 高青邱詩集》第一卷 日本大學法學部中島敦藏書） p.133
[83] 「三月戍袍寒 朔雲捲胡風 氈裘肉食 天寒水草盡、萬里孤軍來 九月匈奴殺邊將轆々 」(《中島敦全集》第三卷 筑摩書房 1989.11 ） p.511
[84] 文本 p.507：「夜毎、狼星が青白い光芒を斜めに曳いて輝いてゐた。（中略）オヤと思つてゐる中に、その見なれぬ巨きな星が赤く太い尾を引いて動いた。」
[85] 「狼星掃天芒角斜」(《續國譯漢文大成 高青邱詩集》第一卷 日本大學法學部中島敦藏書） p.208
[86] 文本 p.512
[87] 〈聞角吟〉(《續國譯漢文大成 高青邱詩集》第一卷 日本大學法學部中島敦藏書） p.345
[88] 德田進《小說〈李陵〉新考》(ゆまに書房 平成 8.8) p.215-2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情的階段則多是五音，五音具有遙遠、隔閡之感；而描述到李陵的悲憤，或李陵的反省時，則多是三音與四音，亦即音節急切。整體而言，〈李陵〉一作即是如上所述，是由主體、辭句、音節等部份的搭配而構築出悲劇性敘事詩的特質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出版年代一律統一爲西元）

佐藤威夫（1957） 〈《李陵》の司馬遷〉《解釈》

中國人民大學（1962） 《歷代文選》中國青年出版社

太田好一（1971） 〈中島文学の頂点—《李陵》〉《解釈》

勝又浩（1971）〈《李陵』の構図〉《日本文学》第二十巻第三号

佐々木充（1973）《中島敦の文学》桜楓社

《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叢書 梶井基次郎・中島敦》（1978）有精堂

木村東吉（1978） 〈《李陵》の構想〉《日本文学》第二十七巻

西谷博之（1978）〈中島敦《李陵》論〉《文学語学》第八十三号

班固（1978）《漢書》全五冊 啓業書局

北条博幸（1980）〈《李陵》の世界—宙ぶらりんの男・李陵—〉《日本文学論叢》法政大学大学院

司馬遷（1980）《史記》全四冊 鼎文書局

奥野政元（1985）《中島敦論考》桜楓社

長野明美（1985）〈《司馬遷》—《史記》を通して見られるその世界観—〉《筑紫女子園短大国文科筑紫国文》第八号

《中國文學欣賞全集 詩篇（七）、（十一）》（1985）莊嚴出版

崔明德（1994）《李陵》 文津出版

徳田進（1996）《小説〈李陵〉新考》 ゆまに書房

藤村猛（1998）《中島敦研究》筑摩書房

村田秀明（1999）《中島敦《李陵》の創造—創作関係資料の研究—》明治書院

劉國輝（2000）《司馬遷全傳》長春出版社

蕭統（2001）《昭明文選》 台灣古籍出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